

教育研究集刊
第七十輯第二期 2024年6月 頁155-168

書評：評《菁英大學與特權的塑造： 探索全球教育經濟體中的種族與階級》

*Book Review: Elite Universities and the
Making of Privilege: Exploring Race and
Class in Global Educational Economies*

黃郁棠



壹、前言

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時代，人們對資訊的掌握、科技運用的能力以及跨領域的適應能力都在不斷地提升，不論是在物理空間還是虛擬世界，這些進步都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在快速變遷中，全球高等教育也在此脈絡下持續發展，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現今與過去的鮮明對比，跨境的高等教育活動及研究顯著增長，包括國際學生流動、學術合作、大學夥伴關係和聯盟、海外分校、遠距教學等，這些變化不斷地催生新的模式和動態平衡。

從Marginson（2016, 2023）論述的近代全球高等教育擴張浪潮及國際化趨勢，到全球高等教育評鑑話語權逐步成型，再到COVID-19疫情後，大學課程架

構的轉變，還有日漸被強調的多元身分認同價值等，例如：LGBTQIA+或少數族群觀點，這些新舊議題反覆被延伸、檢視，也在不斷塑造著當代高等教育的新樣貌。其中，對於社會正義的論證與激辯，是貫穿不同時代教育發展的重要環節，代表著追求更加平等、民主、開放的進步價值。它體現在各個層面，像是國家教育政策走向，或是大學招生比例、流程的轉化，也影響著學生的教育經驗。

《菁英大學與特權的塑造：探索全球教育經濟體中的種族與階級》（*Elite Universities and The Making of Privilege*）一書亦然，其重點關注於全球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經濟體的角色、菁英階層的社會再製、階級壓迫，藉由探索學生實質的校園經驗來描繪高等教育中續存的種族主義及白人特權。Bhopal與Myers運用法國思想家P. Bourdieu廣為人知的幾個經典概念——主要包括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與資本（Capitals）以及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為理論基礎，對來自美國和英國各兩所菁英大學的49位研究生進行訪談，並就所得的質性資料進行分析。

此外，高等教育的「全球品牌」概念，是本書的另一個探討重點，這包括了對「菁英性」（Eliteness）的探討、菁英大學的崛起，以及它們如何以手中握有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來保護自身的品牌，並且追求更多的競爭力。同時，Bhopal與Myers也十分關注在英國和美國的社會脈絡中，受訪研究生的學校教育進程，與他們如何理解資本、菁英大學的品牌價值。兩位作者嘗試以此切入，進而呈現當代菁英大學內複雜的權力結構，以及其所隱含的壓迫。

本書兩位作者——英國伯明罕大學教授K. Bhopal與諾丁漢大學助理教授M. Myers——長年致力於種族、階級等社會正義相關議題的研究（Bhopal, 2022; Myers, 2017）。Bhopal出身於一個印度裔移民家庭，她在社會階級、群體邊界分明的英國社會脈絡裡成長，親身經歷身分認同建構的艱辛。作為一位印度女性，同時也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且又曾於菁英大學（布里斯托大學）攻讀學位，她深諳個人在身分認同建構歷程的複雜性與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Bhopal的研究一路都專注於種族平等、白人特權、少數族裔、黑人及多元兼容等相關議題。

與Bhopal的領域相近，Myers的研究也集中在種族、階級和教育相關的主題。他在針對非主流群體的生活與身分認同方面的研究有豐富的產出，其探討了

吉普賽人（Gypsy）、羅姆人（Roma）、¹旅行者（Traveler）等群體在教育與社會關係方面的經驗。除此之外，在家自學的學生也是Myers特別關注的群體，他致力於探索種族、階級、宗教、大眾觀點，或是政治論述與該群體之間的動態關係。目前Myers專注於教育機會均等和歐洲政策等相關議題上。

貳、本書綜覽及各章節摘述

一、全書綜覽

本書內容環繞著兩大核心——「菁英性」及「身分認同」。其中，菁英性的討論範圍，包括權力結構、話語權、品牌，以及排他性；而身分認同則是包括了針對壓迫結構、學生適應性與教育經驗的探討。順著這兩大核心的論述，作者呈現出當代菁英大學的動態平衡架構。

從研究的設計來看，Bhopal與Myers選擇以研究生作為目標族群。研究生處於學術人員和大學生之外的獨特位置，通常比大學生更瞭解菁英大學的機構實踐和性質，但也時常遭遇社會融入的挑戰。許多參與本研究的學生也積極追求未來的學術生涯，或者往其他不同領域的高階職位發展，這反映出了菁英大學在全球化脈絡下對菁英學生的重要性。

本書的主軸是對研究生的訪談。從豐富的訪談資料中，這些研究生明確識別出菁英大學的特性，並期待從中獲得個人價值。然而，他們的描述也凸顯了「菁英性」本身的模糊之處，特別是作為區別與其他個人或是校院機構的核心標誌。Bhopal與Myers很強調這樣的模糊性，他們發現許多學生在對大學品牌的討論中，反映出了這些模糊性。對受訪學生來說，就讀菁英大學所獲得的價值，與相似社會背景或是同齡人之間的差異，是難以被清楚描繪的，而正是這些模糊性，隱藏著兩位作者積極想要尋找的隱性壓迫。

本書受訪的就讀於英、美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們，大多要同時處理多種身分認同，包括受到不平等對待，或是掌握了某些優勢地位。整體來說，他們至少都

¹ 羅姆人（Roma），這個詞被用作歐洲「吉普賽人」的統稱。

已在菁英之路上，而這些不僅僅源於學生們自身的能力或努力程度，還受到種族和階級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菁英大學透過篩選學生，來獲取並維繫特權，他們以這樣的方式來複製主導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結構。由此觀之，儘管菁英大學在促進階級流動性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與角色，但在當代全球範圍內的權力角力中，這樣的模糊性與隱性壓迫卻是一直存在的。

二、各章節摘述

本書一共分為九個章節，Bhopal與Myers試著呈現英國和美國菁英大學中研究生的觀點與實質的高等教育受教經歷，並探索特權如何在菁英大學中運作。如前所述，他們在本書運用了Bourdieu和CRT理論作為濾鏡，集中探討種族和階級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對特定群體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傷害教育的公平性。以下針對第二章至第九章進行摘述。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菁英大學在全球菁英主義經濟中的核心地位。作者概述了全球菁英的概念，及其如何保護和延續特權，並關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私人投資及市場導向的發展路線，對傳統由國家掌控的高等教育體系所產生的影響。Bhopal與Myers特別強調了，一些全球知名品牌的菁英大學在全球市場中的威權角色，以及它們與政治、經濟的交互作用。隨著大學跨國競爭並服務於全球學生市場，這些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國際化品牌，代表了一種極為強勢的全球文化資本形式，其深入連結著掌握話語權的國家強權意志，菁英群體與菁英大學在支配、影響次級國家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Bhopal與Myers在第三章探究了本書的受訪研究生們，成為菁英大學學生的進路軌跡。進入菁英大學是高度競爭的結果，這反映出其高篩選率、高排他性，且作為一種稀有財的性質。富裕或優勢階級的學生，通常從小就預期進入菁英大學，他們也多半一路就讀菁英／私立學校，這呈現出由菁英大學所向下延伸出的利益交集。相較之下，邊緣或非主流群體的學生們認為，他們的社會背景、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以及種族和族裔差異，都影響了他們通往菁英大學的途徑。本章揭示菁英大學錄取過程中的不平等，凸顯財富和地位在其中的關鍵作用，說明不同形式的資本如何影響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分布，並且導致社會再製。

第四章呈現學生在菁英大學融入及學習的歷程，並且關注家庭背景、社會

階級如何影響他們的高等教育經驗。從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Bhopal與Myers發現，即使進入這些菁英大學，弱勢群體學生也常常感到自己處於次等的地位。他們在求學的歷程中面臨了更多挑戰，因為他們缺乏競爭與適應環境所需的各種資本。相較之下，來自富裕和優勢社會背景的學生則描述了在菁英大學中如魚得水的感覺，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本讓他們更容易適應並感到自在。兩位作者指出，這樣的差異性凸顯了菁英大學內部以及整體社會的不平等，還有階級、種族等非學術能力相關的因素，影響著學生成功的可能性。

第五章探討學生對菁英大學學位價值的理解，及其進入就業市場的期望。本書受訪者普遍認為，就讀菁英大學對他們的職業前景有積極影響。然而，他們也強調，進入菁英圈、獲得高階職缺的機會，並非全然取決於他們在菁英大學的學習成就，反而是極為取決於社會背景與資本的掌握。Bhopal與Myers指出，菁英學位的價值更傾向於讓既有的優勢群體受益，並確保他們的子女未來能夠成功。同時，對於較不具有特權與資本的學生來說，雖然同樣享受著菁英大學學位帶來的益處，但受益程度相對較小。這反映了社會實踐中的系統性不平等，以及特權階層在職業市場中所不斷把持著的優勢地位。

第六章探討有色人種學生在菁英大學所遭遇的經驗，呈現種族、階級和早期經歷如何影響其校園生活。Bhopal與Myers認為，菁英大學內的種族主義是一種司空見慣的常態，且存在於菁英大學環境裡大大小小的人事物中。此外，白人菁英群體的再製，與菁英大學內部系統性和結構性的種族主義有著密切關係。兩位作者運用CRT的觀點，勾勒出弱勢群體在菁英大學中遭遇的種族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也發現，在英國與美國，以及本國學生和國際學生之間，他們感知到的壓迫也有顯著的差異。此外，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的變化，同樣也影響著有色人種學生和白人學生對種族主義的理解。

第七章探討菁英大學的「全球品牌」概念，以及學生如何理解菁英大學的品牌價值。Bhopal與Myers在本章論述了菁英大學的品牌是如何形成及被定義的，其中包括歷史脈絡、高度篩選的入學競爭、校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所占的主導地位，以及一般大眾價值的認可。兩位作者認為，公眾的認可對菁英大學在全球經濟體中作為一種合法且權威性的存在，並發揮跨域影響力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本書受訪者普遍認為他們的大學品牌具有重要的價值，雖然除卻具權威

性的全球高等教育排名，很難把菁英大學的「品牌價值」量化成可等量齊觀的產值，但此一價值認同卻與他們未來職涯發展的競爭力有密切關係。此外，全球品牌亦塑造了鮮明的個體和集體身分認同，包括研究生或菁英的身分，並且品牌價值為個體帶來的效益，也反映出大學內部的不平等。

Bhopal與Myers將第八章的焦點更加深化在菁英大學中種族主義的探討，他們指出，在菁英大學中，白人身分或相關的價值體系被視為是較有價值的，同時，他們更主張白人資本（White Capital）是菁英大學中最有價值的資本。兩位作者進一步探討了白人資本如何影響學生融入到既有的菁英環境及權力結構中，並說明白人身分如何作為一種權力的形式，貫穿於菁英大學的核心結構。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有色人種學生因其白人資本的缺乏，在菁英大學場域中的競爭往往處於劣勢，相反地，白人身分被視為優勢群體學生的自然屬性，並用來合理化菁英大學的預設價值體系。當代菁英大學的權力核心與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緊密連結，並且確保了白人菁英的利益及社會再製。

在結論的第九章中，Bhopal與Myers回顧了菁英大學如何複製不平等。他們將菁英性的可識別性視為是一種社會構建的產物，並賦予菁英大學合法化的權力形式。菁英大學的地位在國際上得到普遍認可，它們作為菁英知識的生產者，在教育領域內有著極為合理且穩固的地位，其校友群所建構的強大社會資本網絡，輕易地便將影響力延伸至商業、政治和媒體等各種領域，而這些領域的菁英成員往往就來自菁英大學，進一步確立了菁英大學在當代全球經濟政治結構下的角色地位。兩位作者強調，菁英大學的服務與光環，實際上始終是出自於自身利益，這也是校園內種族主義和階級壓迫存在的根源。在現實的情境中，菁英大學與白人、中產階級菁英的利益保持一致，而對部分的非主流或弱勢群體而言，像是參與本研究計畫的部分研究生們，某種程度看來，他們也將自己與既有的壓迫結構融為一體，使得菁英大學始終維持著不平等的動態平衡。

參、評論及啟示

一、社會正義：從追逐分配正義轉化到更為關注教育經驗、複雜身分認同

無庸置疑地，Bhopal與Myers在社會正義的追求上，站穩了既傳統又簡單有力的鮮明立場，他們揭露了眾多在當代全球高等教育生態中的不平等、階級壓迫、依然存在的種族主義、學生們在高等教育場域所遭遇的挑戰，以及人們面對諸多結構性問題的困境。這些問題就如同Myers自己所說的，總有許多類似的研究，提出一些我們或許不會感到意外、可以預料到的結論，當然，包括他們自己的這本書，最終其實也就是要告訴我們：世界仍是充滿了不公與壓迫。

2024年的今日，如開頭所述，在這個社會正義被高度強調、人們掌握資訊與科技能力強大的AI時代，我們仍舊要花這麼多的時間與篇幅，來討論種族主義、階級壓迫這些乍聽之下略顯老派的議題，且又得到了一些不令人意外的結論，或許是既寫實又虛幻的。然而，誠如Bhopal與Myers所強調的，這些結構性的壓迫，從來都沒有消失，反而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經濟體的共同鏈結中，變得更加隱晦、包裝得更為精美。

（一）從分配正義到對教育歷程的關注

2015年，聯合國宣布了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旨在建構出「為所有人實現更美好、更永續的未來的藍圖」，也就是說，這是以追求全人類更好的未來為目標，所提供的基本價值指引。其中的第四大目標：優質教育（SDG Goal 4: Quality Education），即為確保兼容（inclusive）和公平（equitable）的優質教育，並促進所有人的終身學習機會。立意極美，然而「所有人」的這個概念本身卻可能有點虛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資源有限，且每個人的出身、天賦及後天的際遇都有所不同。我們在任何時間點觀測到的不平等，都堆疊自過往，所以無論怎麼做，不平等似乎是注定存在的。

然而，這並不代表改變都是沒有意義的。以本書研究所處的社會脈絡之一——英國為例，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擴大參與」（Widening Participation,

WP) 便持續作為該國在教育政策制定上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政策走向影響了大學端的招生體系，使得更多非主流群體或是社經弱勢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參與高等教育，甚至進到菁英大學中就讀。某種程度上，這無疑實現了社會正義，至少單從統計數字來看，菁英大學學生的多元化程度有了顯著的提升，意味著過往被忽略或處於不利的群體，獲得了更多的機會能接受高品質的教育，進而有機會追求可能的社會流動。

在2010年代後，愈來愈多相關研究的焦點發生變化，從一種偏向分配正義² (Distributive Justice) 的取向，例如：關注生員的性別、種族、階級比例等，逐漸轉移到更為關注學生的適應性及教育品質。人們慢慢意識到，並不是把更多的學生丟到校園裡，他們就自動會成功。相反地，這些非主流學生在大學的環境中，可能遭遇的失敗與不平等才是更嚴重的問題。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Bhopal 與Myers的研究所揭示的壓迫與不公，也能更清晰地被歸納為對於學生進到菁英大學後實際高等教育經驗的檢視，例如他們所反覆強調的：從種族身分認同的角度來看，有色人種的學生總是習慣自我懷疑，並且有學習以外的煩惱，像是擔心自己是否被白人同儕所認可？是否被貼上標籤？或者在白人主流的價值體系中，要協調自身複雜的身分認同衝突等，這些都為他們的高等教育之路添增了額外的難度，而這是難以被顯現在數字上的不公。

(二) 複雜的身分認同：同時作為菁英、倖存者、受壓迫者

Bhopal與Myers在本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生，他們特別關注研究生一路進到菁英大學的軌跡，以及他們如何理解及看待自己身為菁英，以及與知名大學相連結的權力關係。在此，兩位作者試著凸顯「菁英」的排他性，因為這樣的排他性也體現在本書的研究對象身上。研究生在大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他們既是對菁英大學圈遊戲規則有一定掌握的成功者，同時在本書的脈絡下，他們也是結構中的倖存者，或是體制中的受壓迫者。

本書的研究對象背景各異，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排他性，主要可以從兩個層

² 根據Lamont (1994) 的觀點，分配正義涉及在有不同需求和要求的個人之間，公平分配社會合作的負擔和獎勵。在當前有關高等教育錄取的討論背景下，分配正義的概念可理解為入學機會分配的公平性，這也與促進社會流動的機會有所關聯。

面去看：偶然性與身分認同。作為研究生的角色，學生們多半具有對於Bourdieu「資本」概念的理解力，作為有色人種或是非主流群體，他們能夠感知到自己的求學路徑，或是成功的偶然性，這使他們更清楚地體認到隱藏的階級壓迫、種族主義或是白人優勢。

另一方面，縱使Bhopal與Myers不斷地強調「菁英大學」在概念定義上的模糊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菁英集團大學³與學生的權力關係是一面倒的不對等。從市場供需、社會經濟上的支配力，甚至是學校的歷史與傳統，學生都是處於較為弱勢與渺小的立場。簡言之，菁英大學通常具有高篩選率、響亮的品牌與名聲，以及與全世界上層集團強大的連結，它扮演著莊家的角色，不但作為追逐學術與思想的殿堂，更是通往上層社會的跳板或必經之路。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菁英」的身分認同——成為最為優先強勢的存在——對其他身分認同亦帶來了排他性。有一通俗的說法：「打不贏，就加入他們！」面對各種不同形式的白人資本，或是在西方社會中預設的價值體系，最務實的做法不是去論證或挑戰，而是在其中融入並生存、尋求共同利益。

二、全球品牌：CRT觀點下的共同利益

菁英大學的存在，乃是綜合多方因素所形成的一種動態權力關係。這些廣為人知的菁英大學，通常具有悠久的歷史、響亮的名氣、出色的研究實力，以及充沛的資源。此外，在本書的研究發現中，Bhopal與Myers特別強調「全球品牌」的概念。這近似於商業品牌上的競爭，知名的優勢品牌具有較高的品牌價值，也往往代表著品質與權威，而高等教育的全球品牌，也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與資源分配。

根據Bhopal與Myers的說法，參與本書研究計畫的研究生多半從大學時期便就讀於菁英大學，且習慣於複雜且多重的身分建構歷程。他們容易察覺到環境與同儕所帶來的壓迫性，舉例來說，書中一名來自美國勞工階級家庭的黑人受訪者分享了在菁英大學遭受歧視的經驗，她發覺自己總是被貼上「得利於優惠性差別

³ 即英國的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與美國的長春藤聯盟（Ivy League）的菁英大學。

待遇（Affirmative Action）政策」的標籤，沒來由地被同儕甚至是教授詢問相關的身分問題、冷嘲熱諷，這為她帶來了冒犯與揮之不去的自我懷疑。根據這位受訪者的描述，她總是感知到隱藏在日常互動與對話背後的不友善與排他性，像是在說著：「妳怎麼可能是屬於這裡的？妳憑什麼占了一個名額？」

對非主流學生群體來說，在菁英大學的場域中，他們不僅時常要面臨像是上述案例般不友善的情境，又或者沒來由地被貼標籤，在適應與融入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他們更需要經歷許多身分認同建構上的衝突。如前所述，「菁英」的身分認同是極為強勢的，對研究生們來說，持續地走在菁英大學的路上，有其實質性的意義與代價。他們大多清楚明白，能有機會在具有「全球品牌」光環的明星大學取得學位，對於個人、家庭，以及未來的職涯發展所能帶來的可能性。

在Bhopal與Myers所運用的CRT觀點中，最早由美國學者D. Bell所提出的利益趨同（Interest Convergence）概念尤為重要。Bell（1980）主張，在爭取種族正義時，只有當提倡者的目標符合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白人的需求和願望時才會成功。從利益趨同的觀點來看，當代民權的進步及對有色人種態度的轉變，基本上與白人不斷變化的需求和利益一致，而此一論調也塑造了兩位作者如何對高等教育的全球品牌進行理解與闡述。

站在一個比較強勢挑戰的立場，Bhopal與Myers仍然質疑種族主義根深柢固地存在於菁英大學中，且深入領導核心。他們嘗試以研究生的觀點來佐證這樣的論調。舉例來說，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能夠理解自己在菁英大學的存在，也為學校帶來了好處，他們不僅知道自己就讀學校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學排名，同時也清楚明白當代被視作高等教育評鑑的某些常見核心價值，像是多元兼容或國際化等。

Bhopal與Myers主張，在國際高等教育的高度競爭脈絡下，不論是保護並且行銷自己的品牌，或是對於種族正義、非主流群體權利的妥協，最根本的驅動力其實就是菁英的排他性，也可以被理解為既得利益者在維護自己的利益。這解釋了為什麼種族主義與階級壓迫依舊存在於AI時代，因為「共同利益」才是權力遊戲的主角。

確實，當代菁英高等教育體系中所隱藏的種族主義或是階級壓迫，如同Bhopal與Myers所批判的，它們只是變得更加地隱晦，躲藏在表象的形式正義與

統計數字背後。然而弔詭的是，已經身在菁英大學的學生，即使有時作為受壓迫者的角色，他們卻也同時是遊戲的參與者、得利者，與瘋狂競逐國際品牌、維持菁英優勢及排他性的知名大學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同時受到白人資本及白人優勢結構的壓迫，又習得這些結構中的價值觀及語言，這是他們在菁英大學的生存之道，也是成為菁英、向上爬升、進到權力圈的必經之路。

三、全書總評與啟示

（一）本書在促進社會正義上的貢獻

《菁英大學與特權的塑造：探索全球教育經濟體中的種族與階級》一書有三個重要的貢獻。首先，有別於專注於高等教育早期經驗，或以大學生為主的類似研究，它提供了相對來說比較少見的研究生觀點，這為壓迫與不公平等社會正義議題的探討，帶來了更為全面且立體的視角。透過本書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描述，豐富了我們對於非主流群體的立場、身分認同之複雜性的認識。

第二，本書主要運用傳統理論與相關的批判觀點，雖然從題材上看並不是特別新穎，但Bhopal與Myers很好地將其延伸到學生實質高等教育經驗的探索，進而提供很多務實的觀點。如前所述，近年來對於社會正義的研究焦點，逐漸由分配正義的取向，轉移到更為關注學生適應性及學習經驗的範疇，從高等教育在「教育人」的功能角度來看，這樣的趨勢有助於促進實質性的平等。促進實質性的平等，亦即盡力去確保、提升每位學生所得到的教育品質，而不僅是在給予更多入學機會，這有賴於眾多基礎研究的成果，作為制定教育政策或是提倡變革的根本依據。

第三，Bhopal與Myers持續延伸學生的高等教育經驗，將其與全球品牌的觀點相互結合，呈現了當代高等教育的生態及權力關係。透過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僅能對於隱藏在多元開放大旗後的結構性壓迫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有機會針對高等教育評鑑價值體系的話語權及合理性進行省思。

（二）對臺灣高等教育的啟發性

回到臺灣的社會脈絡，Bhopal與Myers的研究發現也能與國內的高等教育發展有很好的對話，這體現在兩個不同的面向。第一，身分認同在臺灣亦可作為一種實用的研究視角。作為一個多元族群所構成的社會體系，開放與兼容的價值性

是無庸置疑的。對不同社經背景學生之身分認同的探索與建構，即是在強化多元理解、找出可能的壓迫結構，這能有助於改善或提升學生的高等教育經驗，且促進實質性的教育平等。

第二，本書探討了當代全球教育經濟體的互動樣態，其中關於全球品牌及高等教育話語權的論述，特別值得我們加以思索，並將其延伸到其他面向教育議題的討論。Bhopal與Myers不斷地在本書揭露一個充滿諷刺的現實：在大學極力追求國際競爭力與維護品牌優勢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壓迫與型態不斷變化的排他性，縱使平權與兼容總是在當今全球評鑑中被強調的內涵。秉此理解，我們在打造未來臺灣高等教育環境的進路中，便能更清晰地去思考我們要更加擁抱哪些核心價值、如何分配資源及制定政策。此外，我們也能試著從他們的觀點，將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討論，拓展到全球權力鏈的廣度，進行更為全面的思索。

（三）CRT的限制性與反思

批判種族理論運用在當代的全球高等教育權力架構，或是以西方社會白人優勢體系的菁英大學脈絡中，包括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四所英、美菁英大學，是具有一定力道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既有的社會權力構造是穩定的，且菁英圈或優勢群體本質上是具有排他性的。

西方主流的社會權力架構中，融合了本書所不斷強調的白人優勢、白人資本。這是複雜的歷史發展脈絡所累積而來的結果，也反映出了特定國家、群體對政治、經濟、教育話語權壓倒性的支配力，進而造就了權力的不對等、被壓迫者與相對的弱勢群體。在這樣的基礎上，不論現代思潮、科技與資訊能力如何普及，結構性的衝突總是存在，這使得CRT永遠都有批判的對象與空間。

然而，近年來美國社會在CRT的議題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特別是教育、法律、政治等相關領域，在有些學校或機關大力推廣相關課程的同時，許多州直接立法禁止CRT課程介入到學校教育。在種族議題本身就敏感性十足的多元民族社會脈絡中，CRT被許多反對者批評為另一種形式的種族主義，一種將仇視白人的歧視框架直接塞入個人認知、導致族群分裂的「歪理」。這樣的情境反映出CRT一些本質上的限制性。

確實，CRT的確能指出現存的社會體制下的壓迫與權力關係，但它卻難以在自身理論的批判路徑中，提出取而代之的解方，也難以證成權力結構轉變後，新

的政權或優勢群體存在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若想要單憑批判理論架構的研究成果，來推斷體制或是政策該要如何具體改變，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

肆、結語

《菁英大學與特權的塑造：探索全球教育經濟體中的種族與階級》呈現出的研究成果，深化了我們對當代菁英大學生態圈中壓迫結構的認識，如Bhopal與Myers在第九章結論所述：「也許我們研究最顯著的發現，就是在菁英大學中，不平等是如何公然地存在，它們都在我們的視野中，這不是什麼秘密」（p. 128）。然而，即使它們就活生生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要促進社會正義、改善既有的壓迫與不公，也絕非容易達成的目標，我們除了需要大量的論述及基礎研究的佐證，更需要將這些成果轉化為集體行動的動能。而筆者認為，本書最大的應用性與啟發所在，便是帶著人們更為深入且全面地去理解現實情境，讓我們有機會從中找出一些務實的做法，就如Bhopal與Myers不斷強調的，要去關注轉變及過程，而非只是做出廣泛性的結論。

DOI: 10.6910/BER.202406_70(2).0005

參考文獻

- Bell, D. A. (1980).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interest-convergence dilemma. *Harvard Law Review*, 93(3), 518. <https://doi.org/10.2307/1340546>
- Bhopal, K. (2022). Academics of colour in elite universities in the UK and the USA: The “unspoken system of exclus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7(11), 2127-2137.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21.2020746>
- Lamont, J. (1994). The concept of desert in distributive justic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4(174), 45-64. <https://doi.org/10.2307/2220146>
- Marginson, S. (2016). The worldwide trend to high participation higher education: Dynamic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clusive systems. *Higher Education*, 72(4), 413-434.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6-0016-x>

- Marginson, S. (2023). Limitations of the leading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idea wrong or is the fault in reality?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1-20. <https://doi.org/10.1080/14767724.2023.2264223>
- Myers, M. (2017). Gypsy students in the UK: The impact of “mobility” on education. *Rac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21(3), 353-369. <https://doi.org/10.1080/13613324.2017.1395323>